

辞书研究丛书
CISHU YANJIU CONGSHU

辞书研究与 辞书发展论集

王铁琨 李清山 主编

CISHU YANJIU YU
CISHU FAZHAN LU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丛书
CISHU YANJIU CONGSHU

148524

辞书研究与 辞书发展论集

王铁琨 李清山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书研究与辞书发展论集/王铁琨,李清山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8

(辞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26 - 3761 - 4

I. ①辞…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汉语—辞书学—文集 IV. ①H1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417 号

责任编辑 王慧敏
助理编辑 李潇潇 郎晶晶
封面设计 姜明

辞书研究与辞书发展论集

王铁琨 李清山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 ewen. cc www. cishu. com. 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1 字数 334 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761 - 4/H · 537

定价: 4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目 录

辞 书 规 划

- 张志毅 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 / 1
苏培成 要有一部收字量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字典 / 16
汪惠迪 编一部全球华人都适用的字典 / 24

汉语辞书编纂

- 吕永进等 《新华字典》方言字条目的历时考察 / 28
吴英成等 语言四技与汉语学习者词典编撰整合 / 44
李大遂 字典应将理据说解作为汉字诠释的重要内容 / 57
郭曙纶等 关于汉语辞书的两点想法
——谈一组同义词的释义与收录问题 / 69
宋 婕等 我国语文词典时间词释义状况调查 / 75

辞 书 现 代 化

- 亢世勇等 我国计算机辅助词典编纂系统初步调查研究 / 83

- 孙 毕 论辞书数字化出版中的数据发掘与知识发现 / 97
连登岗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古汉语语文辞书编纂 / 105
王东海 出版社词典网络编纂 workflow 研究 / 115

国外辞书编纂与辞书对比

- 郑述谱 俄国词典编纂的传统与新篇 / 135
徐 海 英语学习型词典在释义方面的特色 / 153
张科蕾 日语辞书与我国日语学习 / 170
彭广陆 日本出版的汉日词典与我国出版的日汉词典之比较 / 182
杨金华 从法语学习词典的注释看汉语学习词典的改进 / 194
于屏方等 汉、英学习词典意义索引结构设立的对比分析 / 210

辞 书 出 版

- 王 敏等 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出版状况调查 / 222

辞 书 使 用

- 解海江等 我国语文辞书用户辞书知识状况调查研究 / 235
张莹莹等 语文辞书使用的研究 / 261
许 琨等 汉语学习型电子词典释义和应用状况调查研究 / 275

辞书队伍建设

- 王东海等 服务于辞书规划与辞书政策的“我国汉语辞书队伍库及
信息挖掘系统”建设 / 297
- 张绍麒等 我国辞书学队伍建设说略 / 318

辞书发展史

- 袁世旭等 谈汉语义类词典编排体例的发展 / 335
- 姜 丽等 谈字典收字立目的发展 / 349
- 王 晓等 谈近现代的汉语语文辞书评论 / 362
- 郑 丽等 谈汉语语文辞书修订的发展 / 384
- 编 者 后记 / 405

辞书强国

——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

张志毅

(鲁东大学中文系)

辞书大业,惠及天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是民族思想、科学、文化和语言的结晶,是国运兴盛的标志。我国的辞书事业伴随国运,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辉煌阶段;(二)新兴阶段;(三)辞书小国阶段;(四)辞书大国阶段;(五)走向辞书强国阶段。最后一阶段,还有一段遥远的路要走。

(一)辉煌阶段,指先秦至清末。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那时候国学独秀,国学的广袤沃土培育了近千种辞书。除去专书辞书,普通辞书也有600多种,而且形成了六大族群:

1. 词书,主要有《尔雅》、《广雅》及《尔雅义疏》等雅系词书20多种,《方言》及《方言类聚》等方言系列词书10多种,《释名》及《释名疏证》等释名系列词书多种。这些词书,不仅对释义、解经、读书有辅助作用,而且对全民族向共同语的核心意义靠拢有着恒久的维系作用。

2. 字书,主要有《说文解字》及《康熙字典》等系列字书200多种。

* 《人民日报》2010.10.12发表过《“辞书强国”究竟有多远》,在此基础上扩充成此文。

这些字书,对单字、单音词、语素的定形、定义、定音,对书面语的标准化,都有久远的规范作用。

3. 韵书,主要有《广韵》及《中原音韵》等韵书系列 40 多种。它们既是韵文用韵的总结和指导,也是读书音和共同语标准音的规范。

4. 目录,主要有《四库全书总目》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目录系列书 20 多种。利用这些书,不仅能检索图书的名称和要点,而且能指导阅读。

5. 类书,主要有《艺文类聚》和《永乐大典》等类书系列 50 多种。利用这些书,不仅能检索辞藻典故和诗词文句,而且能查考史实和事物掌故。

6. 政书,主要有《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和《清会要》等政书 50 多种。利用这些书,不仅能检索古代政治经济等制度史,而且能查考文化、学术史料。

在漫长的世界辞书历程中,神州九域筑起了光辉夺目的里程碑。与英伦三岛相比,中华大地在早期辞书跑道上领先了 1 800 年,汉语大型辞书《字汇》(明梅膺祚,十四卷)与几本英语小辞书几乎同时出现在 17 世纪初。

(二) 新兴阶段,指 1911 年至 1949 年。这一阶段,平均每年出版 38 部辞书,掩映着国学余晖和西学晨曦。一方面,《说文解字诂林》(正续 1 530 卷)、《词诠》、《辞通》、《诗词曲语辞汇释》等掩映着一缕缕国学的余晖;另一方面,《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国语辞典》等折射出一条条西学的晨曦,这预示着中国辞书事业从古老的辉煌转向现代的新兴。只是这条道路上的障碍太多,在马拉松赛中,我们被远远地抛下了。

(三) 辞书小国阶段,指 1950 年至 1977 年。这一阶段,平均每年出版辞书 125 部,是前一阶段的 3 倍。然而,其中缺乏耀眼的传世之作,只有《新华字典》作为新中国辞书的代表,在联合国辞书展览厅里摆放在西方多部巨型辞书的一侧。

(四) 辞书大国阶段,指 1978 年至 2000 年。这一阶段,平均每年出

版 600 多部辞书,差不多是前一阶段的 5 倍,且不乏传世之作,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1979)、《辞源》(1979)、《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俄汉详解词典》等。

(五) 走向辞书强国阶段,指从 2001 年至 21 世纪 50 年代前后。这一阶段,前十年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后几十年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赶超辞书强国,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一、要成为辞书强国,人才必先强

辞书强国,首先强在人才。各辞书强国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博学的编纂专家。近三百年以来,辞书界人才辈出,数不胜数。仅举其中的领军人物(以生年为序)为例:

S.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牛津大学肄业,英国文学家,词典之父,1755 年出版《英语词典》(2 300 页,4 万多条)。

N. 韦伯斯特(Noah Webster, 1758—1843),1778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美国拼写课本》至今已销售 1 亿册以上,被誉为“美国文化独立宣言书”,他还写过多篇英语论文。1828 年出版了《美国英语词典》上下卷,收词 7 万条,比当时约翰逊词典的最新增订版多收词目 1.2 万余条,释义也更准确、细致。

P. A. 拉鲁斯(Pierre Athanase Larousse, 1817—1875),法国语言学家,百科全书编纂家。他的著述比巴尔扎克、雨果还多,影响最大的是《19 世纪万有大词典》(1866—1876,15 卷,后有补编 2 卷)。

K. 杜登(Konrad Duden, 1829—1911),德国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1880 年出版《德语正词法大全词典》(收词 2.7 万条,17 版收词 16 万条,至今已出 23 版)。后来,出版了一系列杜登词典。

Д. Н. 乌沙科夫(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шаков, 1873—1942),苏联语言学家,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主编《俄语详解词典》(4 卷)等词典。

С. И. 奥热果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Ожегов, 1900—1964), 苏联语言学家, 词典编纂家, 莫斯科等大学教授。谢尔巴、维诺格拉多夫的高足。《俄语详解词典》的主要编写者,《俄语词典》主编,《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17卷)编委,还与他人合编了其他一些词典。

P. C. J. 罗贝尔(Paul Charles Jules Robert, 1910—1980), 法国文化学者, 辞书编纂家。1945年以后, 编纂了著名的《大罗贝尔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和《微型罗贝尔词典》。

中国只有吕叔湘等几位先生是现代语言学者兼词典编纂家。我们要培养出这样一流的人才, 至少需要40年。为什么要40年? 跟这些世界名家相比, 中国学者的差距在哪里? 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 知识结构、数量和水平。上列编纂专家首先是学者, 他们精通语言学、语文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或科学技术。他们在辞书之外, 大多数都有重要论著传世。我国的许多辞书编纂者, 高水平的论著几乎没有。

(二) 创造能力。个人的创造能力, 一部分靠天赋, 一部分靠社会。近几百年, 中西个人的创造能力的差异, 主要在于社会。《英语词典》(1755年)产生前后的时代, 正是文艺复兴之后, 启蒙思想兴起之时。当时的社会, 给科学创造提供了六个社会性的基石: ① 民主自由的环境; ② 多派新兴哲学共存互补; ③ 多元先进文化互惠互利; ④ 多种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竞相发展; ⑤ 科学的理论思维处于主导地位; ⑥ 以创新性为本的教育普遍展开。因此, 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 辞书界也不例外。在宏观上, 辞书界出现了实用主义、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三种主要思潮, 同时也创造了百科、语文和专科等不同类型的现代辞书。在微观上, 他们把词义分解为基本义、附属义和语用义, 韦伯斯特把约翰逊的贡献和牛顿在数学上的贡献相提并论。而韦伯斯特则被誉为“美国语言之父”。当时的中国, 著名学者有戴震、钱大昕、桂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朱骏声等, 他们正处于国学的乾嘉初期, 崇尚实学、

朴学或考据,轻视义理、推理,无视新科学。因而当时他们那一代的成果只限于国学继承类的,如《康熙字典》、《十三经注疏》、《大清会典》、《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注》等。

(三) 大业精神。约翰逊、韦伯斯特等学者不仅仅是将辞书研究和编纂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更将其视为一生的事业,甚至将其作为几代人的大业。职业精神,对大业稍有帮助;事业精神,对大业大有帮助;只有大业精神,才能确保完成经国济世的千秋大业。例如《牛津英语词典》,自1858年筹备,26年后即1884年出版第1卷,再过44年即1928年才出齐10卷,6年后即1934年出版1卷《补编》,四五十年后即1972年、1976年、1982年、1986年分别出了4卷《补编》,1989年出版《牛津英语词典》第2版,共20卷。最终编成2.1万页,60多万个词条,240万条书证的超大规模词典,历时131年,数易主编,五代接力,千余人参编。唯此,方铸就千秋伟业!

二、要成为辞书强国,理论必先强

在多种现代科学,特别是语言学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词典学进入了现代科学行列。仅仅是《法语宝库》到1969年就用现代理念和手段搜集相关语言学资料5万多篇/部。现代辞书科学新理论的产生,主要通过五条途径:升华、继承、借鉴、移植、创造。

辞书强国的辞书编纂理论起码具有下列六个特性:① 理性;② 本质的整体性;③ 内在的逻辑性;④ 多维的系统性;⑤ 结构的和谐性(这是爱因斯坦强调的);⑥ 多元论(奥地利籍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P. K. Feyerabend的主张),而不是一元论(托马斯·库恩的观点)。从编纂实践上升为辞书学理论,必须经过范畴化(categorization)。Lakoff(1987: 5)认为:“对我们的思维、感知、行动和言语来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范畴划分更基本的了。”范畴是知网的网结,是认知的枢纽,是理论的支撑点阵。范畴体系,就是理论。如何范畴化?辞书强国主要通过

六种程序：经典范畴化，原型范畴化，提取最主要的区别特征，用最简明的词语、公式或模型表达范畴特征或属性，借助多种思维方式，尽可能杜绝一切直觉、内省的简单枚举。

辞书理论研究的成果，可以概括为四类：① 综述型。对前人（古今中外）理论予以介绍、归纳、概括、总结，并举例说明。② 跟踪型。对前人（主要是外国的）某一理论予以阐释、分析、应用——描写、解释某些现象。③ 创新型。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如理念演绎辞书、同场同模式等）、新原理、新规律或新法则等。④ 引领型。提出新理论，被国内外学者引用、赞同。相较而言，我国综述型、跟踪型研究成果较多，创新型很少，引领型尚未出现。

在这般情况下，必须极力倡导：理论先行。

辞书理论，是辞书科学动力的第一要素。只有不断创新的辞书理论，才能增加辞书科学的知识总量。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科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理论。”

要成为辞书强国，辞书原创理论必须先行，尤其是必须输出领先的辞书理论。

必须树立新观念：理念演绎辞书，理念领跑辞书，理念提升辞书。否则，辞书只能在低层次上循环。现代辞书编纂，首先不属于经验范围，而属于理性范围。《法语宝库》主编伊姆勃斯认为，“搞不好词汇学也不能搞好词典学”。当前辞书强国研究的热点理论有 12 个：① 实用主义、规范主义、描写主义三种主导思想及其有机结合问题；② 解码词典和编码词典的对比和融合问题；③ 传统释义方法、新兴释义方法及其综合问题；④ 辞书元语言研究及其应用；⑤ 语料库研究及其应用；⑥ 辞书的信息处理与计算词典研究；⑦ 辞书编纂现代化和辞书的电子化研究；⑧ 辞书网络化研究；⑨ 语言和知识词典化研究；⑩ 国际辞书比较研究；⑪ 读者需求研究；⑫ 各国辞书史研究，先进经验吸收和借鉴研究。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谈谈前五个问题。

（一）实用主义、规范主义、描写主义三种主导思想及其有机结合问题

辞书强国研究和词典编纂者，对这三种思想，都应有清醒的认识。

先说实用主义。世界各国最早的辞书“难词词典”、“双语词典”都凸显了实用主义，后来的以“学习词典”为代表的一些辞书也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体现了实用主义。辞书的“实用”有多种：读经、释难、翻译、正音、正形、辨义、识字、用词、选词、查考、推广标准语……一本辞书最好突出一两个“实用”目的，适当兼顾其他。

次说规范主义(或规定主义)。规范，就是标准化，是对实用、描写的积极规约，是各国古今共同语的社会性需要。《英语词典》(约翰逊)、《法兰西学院词典》、《俄语详解词典》、《俄语词典》(奥热果夫)、《俄语词典》(科学院)等等辞书都贯彻了规范主义的思想。它们显示了多种规范原则：非逻辑原则(不能用狭义的逻辑苛求活生生的语言)，历史原则(承认语言的历时演变)，习惯原则(从俗从众)，系统原则(兼顾个体及相关系统)，科学原则(合于历时和共时学理或规律)，功能原则(最能体现语言的功能的单位是首选)，权威原则(权威的文本、用法常被公认)，刚柔原则(语言要素的取舍、推广范围等都要注意刚柔)，民族原则(外来词多民族化)，国际原则(术语宜国际化)，准确原则(能指应无偏差)，经济原则(用较短的形式反映较多的内容)。历史告诉我们，上述这些原则，都是互相关联的。少数是双向关联，多数是多向关联。一本辞书应兼顾几个原则，适当照顾其余。

再说描写主义。韦伯斯特《美国英语词典》和《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等词典以描写为主，兼顾实用和规范，描写给实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给规范提供了标准化的广泛基础。强国辞书中的描写，都尽可能地反映语言单位的五方面情况：① 词音——语音常体及变体、现代标准音、古旧音、方俗音、书面音、口语音、重音、轻音、变音；② 词形——词形常体及变体、古旧形、方俗形、常用形、罕用形、讹误形；③ 词

义——词义常体及变体,现代语言义、古旧义、方俗义、常用义、罕用义、言语义;④ 语法——词的语法常体及变体、词性及其活用、常规及变异形态、句法标准功能及变异;⑤ 语用——词的语用常体及变体、音形义的修辞用法、从言语向语言的过渡用法。

一本好的辞书,不可能同时贯彻三个主义,而是以一个为主,兼顾其他。

(二) 解码词典和编码词典的对比和融合问题

比起解码词典,编码词典至少有九个要素:① 二语习得的新理念;② 词目、义项的常用性;③ 义项划分的精细性;④ 释义中心的凸显性——词的用法;⑤ 元语言的可控性;⑥ 释义的综合性;⑦ 例证的语用性;⑧ 语料库的本源性;⑨ 读者本位性。本节只简要论述①、②、③、④、⑥、⑨各要素(余者容后文论及)。

1. 吸收了二语习得新理念

双语词典是学习词典的前奏。促使学习词典产生的第一个理念,就是二语习得的新理念。二战以后,学习英语成了当务之急,因而产生了学习英语的新理念——把词作为语义、语法、语用统一体,突出语用,提示惯用法。二语习得的转向,强调在正确性(correctness)基础上更突出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于是1948年演绎出世界上第一部外向型、学习型词典——*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高阶当代英语学习词典》,Hornby主编)。20世纪70年代进入信息时代,英法美德俄等国涌现出了十多套编码词典。中国至今仍没有一部理想的编码词典。

2. 词目、义项的常用性,编码词典中的常量、变量和足量

词汇是变量,词汇核心是常量。各类、各层次的语言交际,都共有一个基础词汇常量——约三五千个词。这个量,基本可以读懂、听懂书面语和口语。例如,根据Fries统计,英语常用词4 000~5 000

个占书面语用词的 95%，最常用词 1 000 个占书面语用词的 85%（兰多 2005：301）。掌握汉语 3 000 常用词，就能懂得一般语言材料的 86.7%（北京语言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6：1490）。由此演绎出《基础法语词典》、《基础英语词典》、《教学词典》等。这些常量，是学习词典的主体或核心。

词的基本语言意义是词义的常量，词的言语意义即语境意义是词义的变量。学习词典以描写词义的常量为主，也要照顾词义的变量。

义素也有常量和变量之分。义素常量指核心基本义素，义素变量指非核心、非基本义素，即次要并受语境制约的义素。对一个个词位及其义位来说，这个变量常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变。就一个义位来说，义素少的有两个，多的有五六个，再多的有十来个。从变量义素中找出常量，这是学习词典编写者的责任。义素在学习词典里有三个量：超量，足量，非足量。超量，就是给出的义素过多；只有释文中提供必要的语义特征，那才是足量；没有满足释义必要的语义特征，那就是非足量；义素变量中的常量，多数情况下只有三个左右语义特征。

足量，就是最显著的、最具有区别性的、最容易感知的语义特征。其中既有事物本身特征的显著性因素，也有人们认知时注意点的因素，更有义位自身的义素特征。学习词典编写者应注意同时提取这三个因素，并同时赋予最佳的表述。

3. 义项划分的精细性——吸收现代语义学成果

从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洪堡特、密尔、索绪尔、萨丕尔、奥格登/理查兹、布龙菲尔德、吕叔湘、兹古斯塔、利奇、诺维科夫、莱昂斯等，对词义渐渐产生了二分观、三分观、四分观、七分观等。义位主要包含五个要素：第一是所指或外指意义（指物、指概念/观念等），第二是系统价值或内指意义（跟相关词的义差、用差等相区别），第三是各种附属意义（理性、感情、语体、语域、时空等），第四是语法意义（词性、结构、变化、功用等），第五是语用意义。这些现代语义理念，不仅先后演绎出《简明

牛津英语词典》(1911)、《小拉鲁斯词典》(1906)、《俄语词典》(1949)、《现代汉语词典》(1960)、《小罗贝尔词典》(1972)等,而且被编码词典充分吸收并全面推进。

4. 释义凸显词的用法——吸收语用学成果

20世纪,从房德里耶斯到克鲁斯,有些人主张词义就是用法。乌尔曼仅仅称其为“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s)。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到后期对自己主张的“用法说”也产生了怀疑。现代语用学主流学者认为,用法不等于词义,仅仅是词义多要素之一,有的是词的语言义,有的是词的言语义。以此为中心,编码词典吸收了语用学的许多成果。诸如:适当增加词、语、小句等内词条,必须交代词语的语境义及义位变体,凸显词语及其意义常用项(舍弃罕用项),提示话语结构、礼貌用法等。

5. 例证的语用性,编码词典的新组合理念

组合所指的范围比搭配广,除了指词语搭配,还可以指语素之间、短语之间、句子之间及其内部语义的组合。解码词典给出的组合多是短语;已有的编码词典给出的组合多是句子。要强调的是,编码词典不仅必须配以例句,而且必须给出例语。而例语又必须给出两类:常见的组合、特殊(习惯、受限)的组合。

组合理念的中心,主要考虑非离散语法所谓的语句的合格度和可接受度,此外还有常用性和完整性。而语境理念主要考虑自然完整语句的语境,即语句的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最佳语境给被释词的“待填空白”,只能是一值(即被释词),不能是二值或多值(即被释词以外的词)。

6. 编码词典的读者本位性

编码词典把读者对象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置于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例如,选词立目、释义配例,学习词典都是以读者的编码及解码需要为轴心,首先是频率原则,其次才是词汇、词义系统原则。

解码型、综合性词典向积极型、学习型词典靠拢,吸取其释义优点。

《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新版和《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就是尽量吸收了学习词典的优点，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三) 传统释义方法、新兴释义方法及其综合问题

一般说来，释义方法有下列七种：① 同义对释；② 反义对释；③ 素义对释；④ 短语对释；⑤ 个性义征+上义/类义位；⑥ 叙述/描写物征、义征；⑦ 用自然语言完整句子表述义征。①②③④式注重的是被释词和解释词的共性，惯用于解码词典，如《钱伯斯 20 世纪词典》许多地方用同义对释。而在编码词典及类似的词典中很少用或完全不用同义对释，如旧版《小罗贝尔词典》中，同义对释只占 15.02%，《现代法语词典》占 3.7%，《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则全部采用完整句释义。⑤⑥式属于分解释义，注重的是被释词的个性，对于解码词典和编码词典都是适用的，但是使用的限度不同：一般用于解码词典的主条，广泛用于编码词典的主条和副条，但是在副条中还必须注明副条语义、语用个性。⑦式一般不用于解码词典，而用于编码词典，如《BBC 英语词典》、《钱伯斯基础英语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三版)、《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占该词典释义总量的 99%)，但是不宜过多使用，因为用于自然语言完整句子中的词和被释词在许多情况下是不等值的，也就是语言系统的词位常常不等于“语段词”(言语语境中的词)，个例遮蔽了类型，单一遮蔽了多样(多样信息、结构、搭配)，基义遮蔽了陪义。总之，解码词典和编码词典的早中近期显示出的释义趋势是：从单一、分解、句子转至多式(①②③④⑤⑥⑦)综合。《麦克米伦英语学习词典》正向综合释义靠拢。

(四) 辞书元语言研究及其应用

元语言，一是指用来释义的自然语言中的两三千个常用词，叫“释义元语言”或“义元”；二是指代表义素的人工设计的语言，叫“形式语言”、“符号语言”、“语义标示语”等。